

缙云县图书馆藏两堂十王图初探

■ 杨海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一 缙云县两堂十王图的发现和性质

浙江省缙云县图书馆藏有两堂十王图。据该馆斜伟明老师介绍，1979年入藏时是被博物馆摒弃的“民俗画”¹。因县图书馆从县城北部的城隍山上搬到好溪边时，古籍图书的摆放次序被打乱了，斜老师遂允笔者进库查找目录所示的一个民国抄本，三天后才找到该书。路过书库角

落最后一排柜子时，偶然一眼看见了一堆破旧的卷轴，由此开始了一场“艳遇”：卷轴顶端标明“西四平等大王”“东三阎罗大王”的这些图轴，正是民间法事仪式中普遍使用的宗教道场画，这批总数26幅的画像，其中25幅是与仪式、信仰相关的地狱十王图及护法马、赵元帅图，以画风和装潢不同分为两堂。²在20世纪中叶之前，应是民间习见之物，但它们的性质是“民俗画”还是“水陆、道场画”，这是很值得讨论的。³

- 1 2019年初春，经丽水周可木、李开军、缙云陈渭清诸先生指引，笔者到缙云县图书馆调查道教资料。偶尔看到这批画像时，破旧的画轴顶端标签题注有“地府冥司”“东四平等大王”“东三阎罗大王”等字样，顿时感觉自己像是中了大乐透。回京后曾请斜伟明老师复核这批馆藏画轴，得到答复进库房清点结果就是26幅：“这部分东西应该是‘文革’时期‘破四旧’搜来的，知情人应该就是老（副）馆长尹继善（已辞世），‘文革’时期，有好几手推车从废品收购站收来，当时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三馆合一，到1979年各自建制后，古籍和图书归图书馆，因图书馆库房紧张，就一直由尹老馆长（兼文物办副主任）负责。‘破四旧’时从收购站拉来的物品，好东西如字画、陶瓷等，都被博物馆拿走了，古籍也有小部分被他们强留。”说明这批画作在1979年移交时就是此数，缺少的图像很可能是在“破四旧”运动中被烧毁或失落了。我还问过斜老师有无可能会在博物馆，他回称：“应该没有。当时他们是看不上这类民俗的东西，移交后过了几年他们倒是说这部分东西要归他们，曾向局领导要求过，我不同意，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可能收上来就是缺的。”从200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民俗画卷》看，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本文展示的高清图像均由缙图幸福民馆长提供，特向以上诸位先生郑重致谢！
- 2 2021年11月2日，陕西西安中国水陆画研究会蔡元平先生又展示了一堂收藏在云南石屏县某朋友家的清代中叶十王图，除了十殿阎王外，另有两幅是酆都殿和东岳殿，正是这两幅东岳大帝、酆都大帝图，蔡先生断言“这是典型的道教十王图”，并认为“道教十王图是在佛教地狱图基础上演变的，一般佛教以地藏菩萨为主宰，而道教则以太乙天尊为主宰”。也是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
- 3 中国传媒大学戴晓云最新代表作《中国水陆画研究》（科学出版社，2020）特别对佛教的水陆画、道教黄箓斋和民间宗教道场画作了区分，认为三者彼此学习、互相交融，可统称为宗教画，属于宗教艺术，也是信仰的产物，是中国历史和文化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现象，可参见该书《自序》。另戴教授也帮忙鉴定过这批图像，特此致谢！



图1 左监门赵元帅



图2 右监门马元帅

2017年9月21—22日，北京大学举办过一场黄帝论坛。主旨为“庙堂之下的多元文化结构”，讨论包含儒、佛、道三教（家）思想元素的宗教图像——西安水陆画博物院蔡元平先生提供了多幅珍贵实物图像，并在现场进行了学术研讨。会场展示的图像都是在仪式斋醮过程中使用的实物，包括超度亡魂时悬挂祭奉的十王、神灵或祖先图像，有的长、宽各有数

米，规模宏大。

地狱十王，一般称地藏菩萨和冥府十王，简称“十王”¹，是佛教造像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大约产生于晚唐五代时期，宋元明清以来，民间融合佛教水陆法会和道教黄箓斋仪的形式，发展成为度亡魂仪式的具象化载体。²自南宋以后，地藏十王信仰成熟，宁波地区民间画坊制作的十王图就已外销日本、韩国，欧美各博

1 十殿阎罗，也称十地阎君、地府十殿真君等，是冥司地府十个冥官或神祇：西一楚江大王、西二五官大王、西三卞城大王、西四平等大王、西五转轮大王；东一秦广大王、东二宋帝大王、东三阎罗大王、东四泰山大王、东五都市大王图，或称“（地狱）十王图”“十殿图”。

2 在敦煌石窟中，十王变壁画共有16铺，另有榜题一铺，分别为莫高窟第6、8、176、202、217、314、375、379、380、384、390、392、456窟，榆林窟第35、38窟，东千佛洞第5窟。16铺图除榆林窟第38窟、东千佛洞第5窟为十王经变之外，其余均为地藏十王图。在绢本画中，地藏十王图也有16幅，都属佛教十王图。写卷则有纯纸本和带插图两种，也有绢本和壁画，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民众写经祈福或为造像供养、设斋荐福（包括为亡人作斋或为自己预修）形成的信仰载体，糅合了中国本土信仰、道教与佛教的相关知识。

物馆也有收藏,¹ 国内公私博物馆发现和收藏的更多,在明清两代佛教法事、道教斋醮以及民间信仰实践中广泛使用,数量、种类繁多,有壁画、雕塑、石刻、木刻板画、绢画、纸像等不同形式,学界、收藏界或混称水陆画,有不少研究论文和专著可参见。² 这些图像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重要的是历经自然和人为灾害、兵火和政治运动诸劫,作为历史孑遗和文化财产的承载者,所体现的价值也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增加。

二 两堂十王图的不同特点

缙云县图书馆所收藏的十王图,明显分为两堂,在时间上也有先后之别。大致可从题头、形制(包括镶边)及题记捐资者的生活年代、助币单位和数额、画像的内容及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判断。其中一堂有两轴题记标明“民国甲申年”落

款,色彩艳丽,造型生动,左右两侧人名题记历历在目,是深入研究晚清以来缙云县地方社会和民众信仰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首先从形制看,两堂画轴的题头、镶边不同。其中题为“某某大王”的十王图轴,纸色古旧,有浅蓝但几乎褪色的五瓣小碎细花布镶边。其中两轴边框有纪年:“卞城大王”图左侧题记为“民国甲申年冬立”,“楚江大王”图左侧也题有“民国甲申年冬立”。民国甲申是1944年,故这堂十王图的断年清楚,共有十轴,轴端题明“东一”“西五”“东三”“西二”等字样的大王图——这些表示方位的文字和数字,提示了使用时依次悬挂的次序。在画像图面,顶端题榜字样为西一“楚江大王”、西二“五官大王”、西三“卞城大王”、西四“平等大王”(中间有一个破损大洞)、西五“转轮大王”;东一“秦广大王”、东二“宋帝大王”、东三“阎罗大

1 据何卯平统计:“东传日本的宁波佛画《十王图》至少有二十三套、一百八十多幅保存于日本各个寺院和博物馆、美术馆中”(《东传日本的宁波佛画〈十王图〉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3,第70页)。另可参见张纵、赵澄《流失海外的〈十王图〉之考释》,《艺术百家》2003年第4期。

2 从敦煌《佛说十王经》出土开始,学界对十王信仰及“修七斋”的研究考察主要集中在十王信仰的内容与探源研究、现存图像及构图、以地藏为主尊的敦煌壁画、绢画中的十王经变及地藏十王变相形式等方面,涉及宗教史、教派史、文化史、艺术史。如张总《地藏信仰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陈震《平遥镇国寺十王壁画的年代考证与图像配置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北美术学院,2018;何卯平《东传日本的宁波佛画〈十王图〉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3;刘可维《敦煌本〈十王图〉所见刑具刑罚考——以唐宋〈狱官令〉为基础史料》,《文史》2016年第3期;罗华庆《敦煌地藏图像和“地藏十王厅”研究》,《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王汉《江都彰墅庙十王图壁画的调查与初步研究》,《扬州文化研究论丛》第16辑,广陵书社,2015,第61—72页;刘伟《山西高平定林寺明代地狱十王图像考》,《美术》2017年第2期;郭燕冰《“十王”图像流变述略——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绘画》,《中国美术研究》2013年第1期等切入角度不同,对象均为各种形式的十王图。郝宪爰有《敦煌十王信仰研究综述》(《河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王惠民有《地藏信仰与地藏图像研究论著目录》详细列举了《十王经》研究论文论著目录。蔡元平《中国宗教水陆画研究》(中国文化交流出版社,2015)也提供了不少十王图。但正如郝宪爰所说:“很少有贯穿整个历史阶段的十王信仰的整体研究、较少研究同时代不同地域同一信仰的差别。”此外也很少涉及受众信仰史和生活史的研究。

王”、东四“泰山大王”、东五“都市大王”——字序从右往左读，十王齐全。另外，还有两轴轴端题称“左监门”和“右监门”的相同花色镶边的马、赵元帅图，民间往往将这两位元帅作为护法神（或门神）与十王配套供奉使用。

从这些标记可见，这堂共有 12 轴画像的十王图，继承的就是敦煌写卷《佛说地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的体系，

与北京大学王汉考察过的始建于明代后期的江苏扬州江都彭墅庙壁画中的十王图及山西宝宁寺壁画中的十王排列顺序一样，都是按奇偶数分配于东西两壁（或两边）。¹ 这一排列方式与《玉历至宝钞》及明清宝卷中经常出现的十王分布方式并不一样，² 应该具有更加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渊源。



图3 十王图题签

- 1 王汉《江都彭墅庙十王图壁画的调查与初步研究》就十王排列顺序、血湖池、阎罗王与冕旒冠业镜、屏风帽子形制问题等展开讨论，最后根据这些元素研究判断壁画的年代和价值，包括绘画艺术价值、艺术史学价值、宗教学价值、历史学、社会学价值，是一篇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的实地考察报告。载赵晶智主编《扬州文化研究论丛》2015年第2期（总第16辑），广陵书社，2016，第61—72页。
- 2 姜守诚注意到：“有关冥府十殿之排序，除《玉历至宝钞》《玉历钞传阎王经》外，其他诸本均为：一殿秦广王、二殿初（楚）江王、三殿宋帝王、四殿五（件）官王、五殿阎罗王（阎罗天子）、六殿变成王、七殿泰山王、八殿平等王、九殿都市王、十殿转轮王。而《玉历至宝钞》《玉历钞传阎王经》为八殿都市王、九殿平等王，余下八个冥殿阎君则同他本。”这种分歧“在清代盛行的民间宝卷中尤为明显”（姜守诚：《十王信仰：唐宋地狱说之成型》，《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9期）。从《玉历至宝钞》《玉历钞传阎王经》开始流传的平等王和都市王的排序差异，也见诸北京白云观保存的十王图中。



图4 玉皇大帝图（或救苦天尊）

另一堂十王图，轴端标记粉色题签，字样是“东三阎罗大王”“西三卞城大王”“西四平等大王”“东五都市大王”等；画面之内顶端题头字样则为“某某王宫”，只有七幅：东二“宋帝王宫”、东三“阎罗王宫”、东四“泰山王宫”、东五“都市王宫”；西二“五官王宫”、西三“卞城王宫”、西四“平等王宫”——字序则是从左往右读，所缺三图为东一楚江王宫、西一秦广王宫、西五转轮王宫。配套的两幅元帅图，轴端题签“右将赵元帅”“左将马元帅”，画面之内

则无题头字样。这堂王宫图无年代，以蓝白相间的小细方格纸镶边为主要标志，故轴端题名为“地府冥司”的地狱图，¹ 画像内顶端题榜字样为“地府”，也因采用同样的镶边，断定是与这七幅王宫图配套使用的，画面人物及故事表达元素，比上述大王图较为简单，画法简略，纸色看起来也似乎更新。

此外，还有三轴图像，与这两堂十王图都不配套。

一轴是玉皇大帝或太乙救苦天尊图，尺幅较小，为一般度亡道场不能缺少的正位主神，既无轴端题字，画面之内也无题字。我曾请四川大学李远国先生辨认，他认为玉皇大帝。蔡元平先生同意“玉皇大帝掌管天上，除三清以外，应管天地一切。但南方人们信仰道教程度很高，对玉皇很崇拜，往往会与十王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十王地位是很低微的”。而现在仍然活跃于民间基层社会的火居道士也往往使用玉皇大帝图或太乙天尊图做度亡仪式，故暂存疑。

另一轴是轴端题签“孤魂”的孤魂图（图5），画面分四层多场景展示，以云彩和左上角的观音连接。上层为天神，即阿弥陀佛与面然鬼王的化身观音，手拿净瓶，收入下两层孤魂，接应其上升到极乐世界，以施食的红围脖小鬼为首，右手端一盆烤制点心，左手分食于男女老幼，意味着可以少变多，一食化多食，一食化

1 此图含义为人出生前即从地库官处借过钱，死前需要还清欠款，故需库官领着担着钱财的挑夫入库清债的场面，否则要被吊打。这种观念类似西方的“原罪”观念，值得关注。

法食，这样每个孤魂都能饱腹，内心充满欢喜之后再被超生。中间第二层主场面就是红衣天师端坐桌前做道场。桌上布置有烛台和酒盅、供奉猪头，旁立“五雷大将军”令牌，红衣天师旁的助手明显为清朝装束，戴红樱圆顶帽，吹箫、敲钹、手持香炉、照妖镜或白条子，桌前走过举着火把、打锣、抬水桶及装买水钱的手提篮为死者买水的队伍。这些场景与传统水陆画的内容基本一致，符合基层民俗和普通民众的心理需求。

第三轴是轴端题签“焰口”的焰口



图5 孤魂图

图（图6），画面也分三层展示。上层为观音及龙女、善才，中层为玉皇大帝（或太乙救苦天尊）和左右协士，下层是肩扛经书的黑脸地域神——这也是这幅焰口图最有特色之处。经李远国先生辨认，认为就是普庵祖师，是流行于浙闽赣地区的民间宗教祖师神，在这幅焰口图上留下的宝贵记载。

这三轴画像都有金色或黄色镶边，也可与地狱十王图配套使用。只是画法较为简单，似不如1944年那堂大王图精美。



图6 焰口图



图7 转轮大王图（局部）

从艺术风格和画面内容看，1944年的这堂大王图，图画色彩艳丽，故事内容丰富，人物造型生动，尤其是每幅图都有白色花纹或细节装饰，使用类似“蛤粉”¹的荧光光粉，使画面细节与装饰看起来熠熠生辉，与之配套的赵、马元帅图的细节尤为有生气。最突出的是转轮大王图，画面出现了具有时代特色的青天白日旗，绘有扛枪佩刀的民国军人，吹奏喇叭

为黑衣黑帽下着蓝衫裤的使者护行——后者手拿可博龙缚虎的绳索，对龙凤狮鹤、牛马狗兔、鼠蛇蚊蝇等六道四生水陆空生灵神物掌握生死大权，也可谓具有时代特色的劝世风俗图。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认为十王图属于“民俗画”也不无道理。

除王宫图缺失了楚江王、秦广王、转轮王三图无法对照外，其他七图，两堂画像——大王图和玉宫图都有可资对照的不同画面和故事内容，包括血湖池（或盆）、刀山火海、汤镬、业镜等重要因素的安排。名称相同的画像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正像江苏扬州江都“彰墅庙中殿东壁的十王图，业镜出现在三殿宋帝王的下方，既不是《玉历至宝钞》所安放的一殿秦广王，也非南宋陆信忠《十王图》中所放置的五殿阎罗王。这是一个全新组合安排，当引起重视”²。包括业镜在内的各种基本元素都值得考究。在缙图所藏的阎罗大王图中，下层左旁镜子里映照出偷牛杀人罪犯，接受两个红衫裤小鬼施行腰斩刑画面。这与北京白云观所藏的明代至民国的阎罗王图都类似，一堂在明代红底黑字题额“冥府五官阎罗王图”画面左边，镜子里映照着跪地人犯偷牛的故事，左下有火海和被腰斩落地的人犯；另一堂在民国“五殿阎罗王”图中，画面是计算账簿中间有跪地人犯，下右刀山池

1 吴连城《保宁寺明代水陆画》（文物出版社，2015，第7页）谈到山西右玉县宝宁寺的明代水陆画“画中白线均用蛤粉描绘，故至今明亮如新，绝不似清人用铅粉作画，经久便黯然失色者可比”。

2 王汉：《江都彰墅庙十王图壁画的调查与初步研究》，《扬州文化研究论丛》总第16辑，广陵书社，2015，第68页。

里沉浮着身体破碎的人犯。¹

三 王宫图画像产生年代试析

缺失年代的王宫图，题记捐资人的货币单位和数额，为我们判断画像的大致年代提供了线索。

(一) 从货币单位和数额看，无年代、缺三图的王宫图，题记的捐资单位一般是“国币壹元（也作‘圆’）”，或者是无单位的贰角、叁角、伍角、壹元等，数额较少，最大值壹元，最少是贰角，叁、伍角常见。这里的捐资单位应该是指银元或是面额较小的银币，²而1944年冬天立像的大王图，捐资者数额较大，如“卞城大王”图的捐资者朱子满等20人，“各助洋伍佰元”，其中

章官培是新建河阳村的富商，³同村的朱昉耕（1923—1983年）则是笔者访问过的朱楚强之父，⁴楚强至今仍住在河阳古村中题额“翊二柏轩”内“循规映月”门洞里的道坛堂屋中；朱子满（1911—1994年）属河阳朱氏文翰长房，曾为“19师无线电台上尉连长”⁵；马陈榜则为新建附近张公桥的富农，后来也在缙云档案馆找到了证明材料。另外，同立于“民国甲申年冬”1944年的“楚江大王”图中，题记有13位捐资者“各助国币伍佰元”，可见“助洋”也就是“助国币”。再看“秦广大王”图题记，有“助法币伍佰元”的13位捐资者。两相对照，所谓的“助洋”“助国币”“助法币”都是同等意义的民国钱币——“法币”，也就是1935年11月4日至1948年8月19日期间，在中华民

1 李信军主编：《水陆神全——北京白云观藏历代道教水陆画》，（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第296、392、389页。案：从已刊图录看，包括明、清各有两堂十王图、民国至少有三堂：明代一堂带红底黑字题十王额，一堂无题额以褐色云朵为檐，均为重彩绢本；清代两堂中一堂以红绿花纹装饰顶（其中展示一图题“一殿地狱”，第386页下右），一堂无题以褐色云朵为额（如题“十殿转轮王”，第393页下）。民国三堂图中，有两堂基本相同：花纹、装饰、故事画面都无大区别，有蓝底黄字十王题额，共展示17幅图（除都市、平等、转轮王只有1幅外，其他都有2幅）；另一堂以黄顶红绿屏风为额，图录展示了8幅图。

2 民国三年（1914年）二月，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十三条，规定以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为价格单位，定名为圆：一圆银币总重七钱二分，铸造比例是银八九，铜一一，以一圆银币作为无限法偿的本位货币，在1914年12月及1915年2月，先后由造币总厂及江南造币厂开铸一圆银币，币面镌刻袁世凯头像，俗称“袁大头”，发行后在各通商口岸及内地均顺利通行。

3 2021年3月22日，笔者在缙云新建河阳村访问朱楚强时，他的回忆就是这样。6月，再次到缙云档案馆查到了马陈榜成为的“富农”和章官培属于“工商业地主”的档案材料，得到证实。

4 义阳朱氏宗谱重修委员会2016年编修《义阳朱氏家谱》第四册，第66页载朱昉耕，奕406步高子，世346，访耕，字则槐，小学60岁。娶凝碧张彩花（1924—2007年）享年85岁。子五：长楚强，美230，次楚雄，美256，三楚胜出养，四楚勇，美358，五楚平出养。女丽琴1964年上初中，嫁本村田泮成（高中）。

5 同见2016年新修《义阳朱氏家谱》第2册，第145页，第4册《行第传》，第37页。美138余生三子，世190，字庆集，小学毕业，娶岩山下赵氏（1922—1977年）生三子文龙、文利、文建（杰）。女二：长女春苓（1945—）嫁武义芦家朱子法，初中；次女美苓（1955—）嫁新建五村楼望东，初中。

国使用的通行货币，开始可 1:1 兑换银元，抗日战争爆发后逐渐贬值，1948 年发行金圆券取代法币，民国货币体制崩溃。¹

故从助币单位、额数推断，无纪年的

王宫图产生的年代更早，应早于 1944 年置办的大王图，大约为“法币”产生之前的晚清或民国早期 1914—1935 年之间的产物——或许是因为较少使用之故，纸色看起来反而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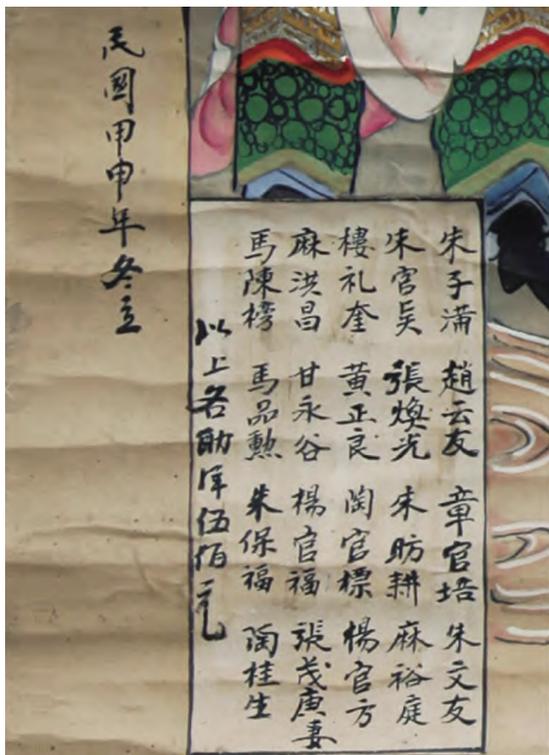


图 8 下城大王图（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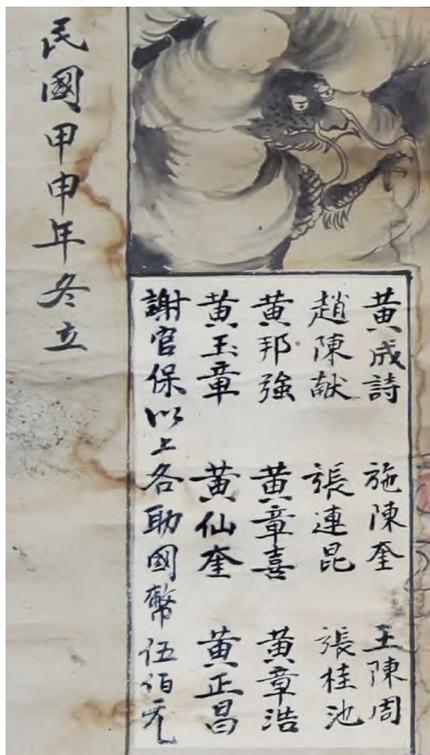


图 9 楚江大王图（局部）

1 民国前期主要使用银元，市场上也有大量国外流入银元，如墨西哥鹰洋等。1935 年国民政府统一财政，废止银元，发行法币，利用法币收兑银元和民间藏银。抗日战争爆发后，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法币发行量大增，信誉扫地。1948 年，民国政府废止法币，发行金圆券，导致财政体系崩溃。法币使用初期与英镑挂钩，1 元法币大约等于英镑 1 先令。抗日战争爆发后，政府实行外汇统制政策，法币成为纸币本位制货币，以 1 元法币换银圆 1 元。1936 年国民政府与美国谈判后，由中国向美国出售白银，换取美元作为法币发行的外汇储备，法币改为与英镑及美元挂钩，1948 年 8 月 19 日起被金圆券替代。参见何盛明《财经大辞典》（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第 430 页）及姚会元《论法币改革》（《学术月刊》1997 年第 5 期）、陈民《法币发行制度与通货膨胀》[《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4 期]、贾钦涵《“纸币兑现”之争与 1935 年法币改革决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 年第 2 期）、吴景平《英国与中国的法币平准基金》（《历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等文献。

(二) 从捐资者的生活年代看, 前后延续百余年, 也不否认王宫图产生于 1935 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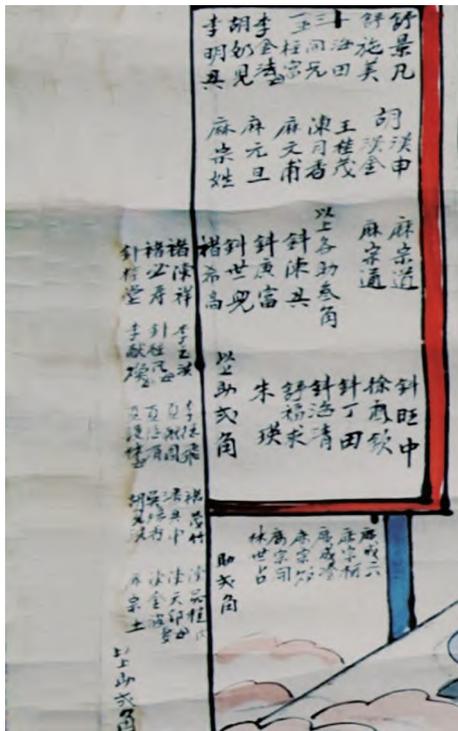


图 10 都市王宫图(局部)

如在东五“都市王宫”图的题名(右图)中, 左侧墨色方框外第一横排的

斜桂堂(1895—1911年)享年 16 岁;¹ 而在墨框内第三横排“助贰角”的斜陈兴(1874—?年),² 缙云西乡大源人, 生于同治十三年, 比斜桂堂早生 20 年, 唯卒年不详。

位于墨框外第四横排的褚茂竹(1884—?年)³ 为缙云南乡大源越陈人, 比斜陈兴小 10 岁, 卒年不详。但他所娶的妻子双坑曹氏(1890—1966年)生于光绪十六年, 享年 76 岁, 活到了 1949 年之后。而生于民国十七年的斜海清(1929—?年),⁴ 卒年不详, 也不排除辞世于 1935 年“法币”开始发行之前的可能。同样, 墨框内第一排“助叁角”的胡奶儿(1893—1987年)为大源斜林照(1891—1974年)之妻;⁵ 斜林照的题名也见诸西三“卞城王宫”图, 虽然夫妻俩的辞世时间已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都不妨碍他们早于 1935 年的捐资行为。在这同一幅图上的捐资者, 有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人, 也有辞世于 1987 年的人, 前后延续百余年, 但都不能否认王宫图产生于 1935 年之前。

1 缙云大源重修斜氏宗谱理事会编:《斜氏宗谱》, 2000 年重修本, 第 517、212 页。

2 缙云《斜氏宗谱》, 2000 年重修本, 第 508、417、214 页。

3 越陈褚氏第 16 届续修宗谱理事会:《褚氏宗谱》卷五《行第》第 280 页载:越陈褚氏后升大房越机公下, 春满公四子名茂竹, 字作苞, 行宽百二, 生光绪十年;第 661—662 页载:娶双坑曹一忠公女(1890—1966 年, 葬竹园), 子三, 锡云, 云兴, 兴儿, 女二:长适陈村, 次适稠门李永尚。2001 年续修本。

4 缙云《斜氏宗谱》, 2002 年重修本, 第 610 页载 1929 年生, 娶余溪王培理女王云仙(1936—?年)。

5 缙云《斜氏宗谱》, 第三编《行第》, 2000 年重修本, 第 552 页。

四 基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信仰用度

在缙图所藏两堂十王图中，最高数额的捐赠者出现在东三“阎罗大王”图题名中，楼希富、楼守良同捐 1200 元：“楼希富公、楼守良公同助洋乙仟贰佰元，谢得顺助洋伍佰元，朱陈良助洋伍佰元。”其中“乙”就是“一”的通假字，享年 83 岁的楼希富（1780—1862 年），¹ 居住在缙云西乡新建岙湖村，与楼守良（1845—1903 年）² 同村，但年长一辈，属于捐资者中少见的生活于 18 世纪的人。

楼守良之孙名洪兴（1916—1995 年），题名也见载于左监门马元帅像，他的侄孙楼章元（1902—1989 年）则列名于东五“平等大王”图中。如果不是这些后辈把祖辈写入捐资者名单，那么，辞

世于同治元年的楼希富——差不多是目前可知最早捐资者之一，与辞世于光绪二十九年的楼守良，都不可能亲自捐资并在 1944 年制作的东三“阎罗大王”图上题名。这一年，缙云西乡新建附近的居民都应该对入侵家园、烧杀抢掠的侵略者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格外需要祈福攘灾，重建家园。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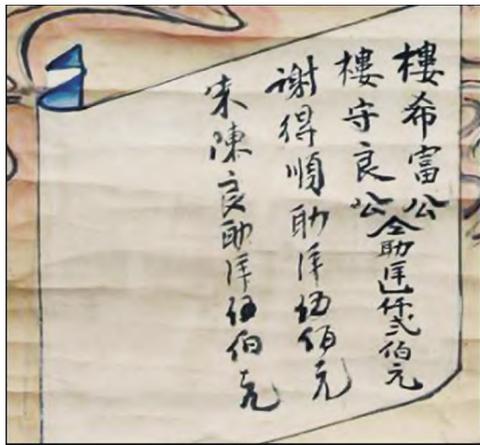


图 11 阎罗大王图（局部）

- 1 1999 年重修《楼氏宗谱》卷一一《行第·宗献》，第 98—99 页。案：该条记载其生于乾隆庚子年，卒于同治壬戌年，为恺 179 公三子，钦赐皇恩讳宗献，字希富，悌 326，娶杨桥李氏（1787—1810 年），与悌 347 黄氏同圻。女一：适本村朱百康；继娶胡氏（1784—1841 年）葬莲花穴，与夫并 347 合葬。子三：金华、金彩（桃叔后）、金寿。女二：长适西岸张献廷，次适西岸舒。继娶陶氏（1786—1886 年），居岙湖。
- 2 2018 年重修《楼氏宗谱》卷一〇《第廿一世仁字行·守良》第 133—134 页载：行仁 434 讳守良，字见善，生于道光乙巳，卒于光绪癸卯，娶妻章氏，子五：银法、银满、银森、银棠、银台（子洪兴洪章）。女一，适长水周。
- 3 据《河阳朱氏宗谱·河阳村大事记》：“1944 年 9 月 18 日（农历八月初二）一百多日军，从丽水窜回新建一带夜宿翠兰塘角，烧毁朱桂洪大院房屋 14 间，朱桂申、朱桂丁大院房屋 9 间。”这场历史灾难，也许就是 1944 年冬天朱氏族人格外踊跃，捐资制作十王图的外因。在各大王图中，朱氏捐资者至少 95 人，在各姓氏中排名第一；似与朱桂申、朱桂丁、朱桂洪同辈的有朱桂良（在“西五转轮大王图”左下侧题名）、朱桂丹（右监门赵元帅图左侧题记）等人。

而楼守良之孙楼洪（红）兴娶了笕头谢氏（1921—1982年），是谢启堂的女婿。谢启堂、谢林喜父子也列名于东三“阎罗大王”图中。¹可见具有姻亲关系的翁婿两个家族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少联动关系，至少在捐资助像这个有关信仰实践的问题上步调一致。楼洪兴的岳父谢启堂有兄弟5人，姐妹2人，属于笕头本村的大户：²启堂父为谢林喜（1873—？年）：“和145公嗣子，笕头本，讳林喜，字祖泰，行肃225，古谱显113……娶东山阳杨作坤公女（1880—？年）生五子：起堂、国堂、德堂、设堂、李堂。女二：长适张公桥马国生，次适丹址施设土。”³东山阳、张公桥、丹址也都在缙云西乡一带，可见捐资题名者的基本社会关系也较为集中。缙云县档案馆有谢启堂的材料，笕头本大队属双川公社。可惜因档案管控，无法得知更具体的细节。⁴

与楼希富、楼守良同框捐资题名前列的谢得顺（1894—1953年），也是笕豆本

村的谢氏族人。⁵他在缙云县档案馆有3条文书材料：包括钟庆乡公所颁发的土地分户清册、民国三十四年灾歉情况登记表等。他比谢启堂年长4岁，父生三（孝21），祖悌就（藏16），在《谢氏宗谱》中有名。

同样捐资“伍佰元”的朱陈良（1892—1964年），比谢得顺还大2岁，是新建河阳村人，出生于光绪十八年，享年72岁。⁶这几位捐资人的生活年代都是从晚清跨入了新中国。根据2021年3月的田野调查资料，河阳村朱楚强在受访中谈到自己对朱陈良的印象是“家贫”，这与1944年东三“阎罗大王”图立像时，他和谢得顺都是“助洋伍佰元”出手大方的形象落差很大。

题名“右监门”赵元帅图的楼子高（1901—1971年），居新建，为“恩赐世袭云骑尉、选举集善区议长福奎（1856—1929年）”第四子，字定光，号直臣，

1 参见1999年重修《楼氏宗谱》卷一一《第廿三世义字行·洪兴》第122页B面。案：缙云档案馆有关谢启堂的文书档案材料，包括笕头本大队第一生产队队员生活安排登记表，显示其家有两口人，个人出身贫农，因查阅管控不能查抄。

2 参见1996年重修《五云谢氏宗谱》卷三“肃225公长子，讳起堂（1898—1979年），字作松，行静227，娶西岸黄汝龙公女（1895—1984年），生三子：凌烁、柳烁、新烁；女四：上适丹址王子芳改嫁李子良；次适番湖楼红兴；三女巧菊适河阳朱望光；四女梅花适新建六村张李春。”第2册，《内纪流支图》，第399页。

3 同上注1996年重修《五云谢氏宗谱》卷3，第2册，《内纪流支图》，第471页。

4 该文书的档号为J073-002-233-058。

5 1996年《五云谢氏宗谱》卷三《内纪流支图·德顺》：肃213公长子，行静218，字汝丰，生光绪甲午—1953，娶山公彦李桂林公女（1903—1988年）生子连通，女适丹趾王鏐富，第2册，第469页。得顺父生三（孝21），祖悌就（藏16），参见卷二《流支图·内纪支系图》，第25—26页。

6 2016年新修《河阳朱氏宗谱》第4册，第9页载奕44始基次子，世47，陈良，字庆长（1892—1964年），73岁，娶重力马氏（1895—1984年），90岁。子海富，美145；女五：长嫁重力杨，次嫁新建楼，四嫁重力杨，五嫁重力杨。

考名长庚，字时升，“娶上黄碧樊灿炎翁”¹长女（1902—？年），生三子：新林，新明，新周。女一：新娥。在缙云方言中，“炎”与“贤”发音相同，故“楼子高”与“东四泰山大王图”中的捐资人“樊灿贤”即“樊灿炎”也是翁婿关系——楼子高的岳家樊氏，居上黄碧村，是新建西乡一带的名人，在缙云档案馆中共有76份文书档案，关系人还有樊宝朱（珠）等。

总之，从两堂十王图的捐资人及社会关系看，大王图的捐资人大致不出缙云西乡一带，王宫图的捐资人大致不出缙云南乡一带。捐资者之间，往往具有血缘或婚姻连接的亲缘联系，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多有互动，信仰实践方面也是如此。

至于具体用度，若从价格参照体系看，1944年上海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在“九月出版的《传奇》，收了七篇小说，大约二十多万字，当时订价伪币三百元。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的增订本，收了十六篇小说，约五十万字，定价法币三千元”²。以此为标准来看，所有捐资者中，出手最大方的楼希富、楼守良两人，也只用了上海一本流行小说价格的1/5，就可照顾到自己或家人的信仰实践活动。

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体现在两堂十王图中的“还报”观念和原则。杨联陞先生曾指出：“约从唐代起，确定从宋代以降，普遍都接受神明报应是应在家族身上，而且穿过生命之链，与《太平经》中较为原始的观念‘承负’相较，后来的还报观念在理论上充实多了。”³“还报”观念对中国社会和制度的影响广泛而多方面，如恩荫封赠制度、牺牲献祭制度、养儿防老观念甚至族刑等，在这两堂十王图中也有相当特别的表现：从捐资时间和题记者的生活年代看，出资最多的楼希富和楼守良，都不可能是亲自捐资的：辞世于同治初年的楼希富和辞世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的楼守良，名字却出现在1944年置办的东三“阎罗大王”图中——最有可能的推测就是子孙替父祖寄名捐资，也有可能是置办图像时，经手人或拥有者将早年捐资者一并移录。无论如何，这都应该是“还报”观念穿越生命之链、报应在家族后裔身上的具体体现：子孙替父祖寄名捐资造办十王图，表现的不管是十王图这种形式，还是使用这些图像的场合，包括通过它们表现出来的贯穿乡民头脑中的“来世”“还报”等素朴观念，至少都已延续上千年仍然充满活力。

1 2018年重修《楼氏宗谱》卷一五《行第》第4页；卷一二，《第廿四世·忠字行·子高》，第8—9页。案：楼子高的岳父“樊灿炎”应即泰山大王图题名中的“樊灿贤”，在缙云方言中“贤”“炎”同音。

2 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学林出版社，1997，第128页。案：“伪币”即华北沦陷后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7—1940年）通过“大东亚联合银行”发行的银联券。在日占时期的上海300元伪币可买一本20多万字的流行小说如张爱玲的《传奇》初版，三年后的1947年再出增订本，字数涨一倍，价格涨十倍，达法币3千元一册。

3 王锺翰、姚念慈、达力扎布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杨联陞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870页。

朱越利教授曾指出：“现在我们的道教史也好，中国史也好，写的是正教史，是教派史，文化史，但是没有写信仰史和生活史——就是信徒怎么信的，怎么影响到他的终极追求，怎么样安慰他的心灵，这方面我们所有的史都基本上没有涉及。另外道教对生活方面的影响，我们只牵扯到了建筑，艺术，园林，但是吃饭，结婚，丧葬，生活很多方面没写。所以希望以后要把这些内容加进去。”¹ 朱教授的意见，不仅是针对《浙江道教史》的提议，也为相关宗教学术研究指明了一个重要的方向。

五 初步结论

缙云图书馆所藏的两堂十王图，是十分珍贵的基层民间信仰的一手记录。最特别的是图像中共有 529 人的题名和捐资题记，包括自晚清道光以来，经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民国并一直延续到新中国等不同时间段的捐资人。从他们的生活范围、捐资数额和彼此关系，大致可以判断这些画像的使用年代和各种功能。

第一，关于画像年代和使用者。1944 年建造的十轴大王图，是一堂齐全的图像，与同材质花色镶边的左、右监门马、赵元帅图配合使用。而缺了三轴

的七幅王宫图，从捐资者的助币单位和数额判断，有可能比大王图使用年代更早——大约在 1914—1935 年之间，比大王图早二十年左右，虽看起来纸色更新，或许是不如前者使用频繁、享受更多人间烟火的缘故。推测王宫图的拥有者或使用者，要比大王图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早一辈。

第二，关于画像的流行地域。王宫图的流行地域大致以缙云南乡为中心，包括大源、越陈等村庄，大王图的流行地域则主要以缙云西乡一带，以新建为中心，包括岩下、张公桥、葛湖等村庄。相比于王宫图，置办于 1944 年的大王图看起来更破旧，当与使用频繁有关。这也意味着大王图的使用者和拥有者人气更旺，生意更好，接受或组织了更多场次的红白法事，包括祈福活动和祭祀攘灾等仪式。还有一点也很重要：缙云西乡比南乡更加富裕，人口更多，村庄密度更高，以朱氏为主的河阳村就是缙云最著名的古村落，至今保存完好，居民安居乐业，精神文化生活与物质经济发展程度的密切关系，在流行和使用区域不同的两堂十王图中也有具体表现。

第三，关于十王图的特殊功能。从捐资者的生活年代分析画像题名者，发现有子女儿孙代替已辞世的父祖或丈夫寄名捐资的现象，这应该就是已流行千年之久的

1 浙江大学道教研究中心编：《浙江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通讯》2015 年第 4 期。

“来世”“还报”等观念在乡民头脑中的具体体现。在晚出的图像中出现早逝的捐资者名字，意味着祈福、报应等观念信仰，可通过子孙后代记名寄托的方式，以贡献金钱置办或装资图像等具体实践来实现或增加穿越时代和生命的福祉或祖先保佑的力量。

总之，从图像的制作、使用和信

奉者三方关系入手，分析缙云图书馆所藏十王图的形制（包括卷轴题头、镶边、画像内容及艺术风格）、新旧（使用频率）、捐资者题记（生活年代、助币单位和数额）等内容，对判断这些图像的性质和发掘其历史文化价值都有重要意义，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